

打壓內房 不利縮小地區差距



國際視野 潘迪藍
Gavekal Dragonomics
資深經濟師

儘管中國大陸的領導人現在持續談論「新常态」，但他們發現中國還是很難擺脫靠住房和投資帶動的「舊常態」經濟增長。

因為舊模式十分吸引，2003至2012年間由住房主導的投資熱潮，確實是減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強大引擎。它為內陸省份帶來巨大經濟效益，令地方當局和承諾讓全國均衡發展的中央領導人都相當高興。但現在房地產熱潮已經結束，地區差距又開始擴大。均衡發展的引擎失速，內地政府不是試圖尋找一個新引擎，而是反覆試圖啟動舊引擎。

新引擎失速 政府只反覆啟動舊引擎

習近平上任後，比前任領導人更強調縮小地區差距的政治承諾。這令到內地政府很難放棄舊有的增長模式，即使它會帶來更高債務和更低生產力的代價。中國是一個幅員廣闊而多樣的國家，自從共產黨執政以來，維持各地區的團結和均衡就一直是個重要課題。

毛澤東傾向將資源優先分配給內陸省份，因為他認為這可以減低被外國武裝襲擊及被外國勢力影響的風險。但這種政策只改變了地區不平衡的模式，不是縮小地區差距。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，地區差距只在擴大，不是減少。鄧小平上場後終止了毛澤東的政策，他容許沿海省份追求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。他的其中一句格言是：「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。」

事實上，在鄧小平當權那十年間，地區差距問題的確減少。若以人口加權的每省人均GDP計算，由1978年到1989年，地區差距問題一直在縮小。即使用其他指標計算，亦有類似的趨勢。因為原先處於不利地位的沿海省份在1980年代爆發高速的經濟增長，令各省之間的差距縮小而不是擴大。

各省人均GDP 差距拉闊

無可否認，內地在2001年成為世界貿易組織(WTO)成員，乃隨後1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主因，因為沿海省份的製造業藉此在全球市場取得了可觀的佔有率。然而，其間內地樓市火熱及經濟改革成果對增長的貢獻，亦至少與加入世貿組織的效應相若。這兩個因素也產生了相輔相成的作用。因為內地企業藉出口取得的盈利

增長，令內地人的存款大增，可以用來投資買樓。由2004年至2014年，各省人均GDP的差距每年都有所減少。但是，到2015年，差距卻略為回升，標誌着地區差距縮窄的第二波已結束。

內地的地區差距並不是遵循簡單的模式來變化，在經濟發展初期就擴大，在後期就縮窄。我比較傾向從具體的機制來思考這個問題。

當有具體的經濟發展進程協助縮小收入差距時，地區差距就會縮小。當欠缺這種具體機制時，地區差距就會穩定或甚至略為擴大。經濟規模效應、城鎮化以及產業的聚群效應，全部都意味着有強烈的動機，令經濟發展集中在較為發達的地區。這種看法的某些證據也可以在美國找到。例如，在二次大戰之後的經濟復蘇期間，美國的地區差距就穩步縮小（那就像過去10年內地的城鎮化和住房建設熱潮）。但由1970年代初開始，美國的地區差距卻只是穩定或甚至上升。

出口利沿海省份 樓市保全國增長

內地已經發現了兩種不同和強大的機制可以縮小地區差距，分別是融入世界的出口市場，以及讓內地樓市自由化。這些機制可以不同的方式令不同的省份受惠。出口當然對沿海省份有利。這不僅因為它們能夠直接將貨物海運出口，還因為它們透過海外華人網絡，與世界其他地區有較佳的社會聯繫。

樓市繁榮可以促進所有地區的經濟增長，但那些能夠供應所需建築材料的省份受惠更大。鋼鐵當然是其中一種主要建築材料，但煉鋼不止需要鐵礦石，還需要煤來讓高爐運轉以及為鋼鐵提供電力。因此，最受惠於樓市繁榮的省份，其實是那些擁有合適礦產資源及工廠的省份。這通常是那些在最初幾十年由國家主導重工業發展的內陸省份。

這些省份與內地官方的地區劃分方式有些分別，所以我們使用了自己的劃分方式。我們將擁有最多礦產和金屬行業的10個省份歸類為重工業帶，這些省份位於北方，面積約佔整個中國大陸三分之一。10個不在重工業帶的東部省份，我們則歸類為沿海地帶。至於其餘11個內陸省份，我們則歸類為混合型地帶。

當地區差距在1980年代和2000年代縮窄時，這三個地帶其實有不同的發展軌迹：

在1980年代的第一波出口增長之中，沿海地帶最受惠，但對於重工業帶和內陸地帶來說，也有始料不及的好處。到了1990年代，這些融合效應全部都停頓了，但在2000年代，卻重新出現。

加入世貿組織帶來的第二波出口增長，引發了沿海地帶的另一波高速經濟增長，但樓市繁榮亦令重工業帶加速融合。這是中國地區融合的黃金年代，兩個有



習近平（圖）上任後，比前任領導人更強調縮小地區差距的政治承諾。這令到內地政府很難放棄舊有的增長模式，即使它會帶來更高債務和更低生產力的代價。（資料圖片）

助地區均衡的引擎（出口和樓市）都處於全速運行階段。但隨着經濟增長在2012年放緩，地區融合效應開始減弱，到了2015年更完全陷於停頓。

刺激樓市 卻增債務負擔

由於全球貿易似乎出現結構放緩，以及內地的住房需求已經見頂，看來任何一個引擎都很難在短期內重新啟動。因此，至少在未來幾年內，內地的地區差距很可能會進一步擴大，就像1990年代一樣。

現時的風險是，經過這麼多年的宣傳和炒作，內地領導人可能真的相信，中國經濟的未來正轉移到內陸省份。這一整代的地方官員一直習慣地認為，由住房主導的內陸經濟繁榮乃是常態，而不是例外的事件。內地的最高領導層亦愈來愈強烈和公開承諾，要縮小地區差距。江澤民在2000年提出的「西部大開發」計劃奠定了這種模式。在2008年環球金融海嘯爆發之後，內地更大幅增加基建刺激，擴大了這種模式的規模。

渴望好像其前輩般人死留名的習近平，接受了前朝遺下的這項任務。他特別關注「鋼鐵地帶」，推出了一個新方案去振興東北地區，將其「供給側改革」計劃主要放在陷於困境的重工業；並且宣傳建設小康社會時，不會忽略任何地區或族群。習近平比較實質的舉措，是容許按揭貸款大幅增長來刺激樓市，以令處於困難的重工業省份今年出現一些經濟增長。

在政治上，控制不同地區的貧富差距有其重要性。這令到內地政府綁手綁腳，不得不反覆刺激樓市和投資，給國家經濟帶來了愈來愈大的債務負擔。